

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

复性书院讲录

马一浮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

复性书院讲录

马一浮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复性书院讲录

马一浮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: 2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市市中印刷五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7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7—209—02267—8

B·125 定价: 18.50 元

总 序

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时刻，人们更加热烈地展望、描绘未来，同时也以复杂的心情回顾、反思着过去。20 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发展道路，便是这种回顾、反思中的重要课题。应该说，这种回顾、反思不仅仅属于过去，而且联结着未来——联结着中国的 21 世纪。

人们要确切地了解一个时代思想学术的精神实际，首要在明了它的社会背景，换句话说，先得吃透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，兼及主要矛盾双方的特点，以及它们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，尤其在不断前进中体现的客观发展规律。研究中国近、现代思想学术，同样也离不开这一点。

大家知道，旧中国是贫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，它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对象，虽还多少不同于当时仅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，过去，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“次殖民地”，那是很恰当的。但中国又是一个广土众民、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，即是存在辉煌过去的大国，只是由于长期的闭关自守、政治腐败，乃至影响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停滞不前，从而大大地落后了。同时由于思想学术没有实现近代化，没能大力发展实验科学的研究，导致综合国力不强，这样，就自然形

成了一种只有挨打的局面。于是西方各种思想，乘虚而入，也就是毫无选择地被介绍进中国来，难免令人眼花缭乱。由于当时人们对自己、外境还缺乏深入调查研究，并不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国情，加之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又演进得非常快，在思想界便产生了“盲目排外”、“崇洋媚外”等偏向，以致影响到，即使是立场坚定的爱国志士，一时也有未能跟上时代前进，确切知道什么是眼前中国真正需要的，……。历史在曲折中发展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，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，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，这就使得旧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各方代表自然结成了联合阵线，一致从事抵抗这种新思想，尽管他们各人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，面目也不一样；同时也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学者、思想家，当时限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环境，仅从书本上了解到一点马克思主义，由于脱离具体革命实践，自然体会有浅有深，一般说来，不可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。这就形成了1949年前非解放区思想学术界的五花八门。但在现实矛盾的发展中，又在酝酿着新的突破。

就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而言，思想家、学者们由于接受过去思想文化影响的不同，便有了标榜复兴儒、佛、道学说乃至墨、法……各家的差异。在学风上，有一部分人，喜欢迎合一些外来的新学术，于是，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，也有被披上一层外来资产阶级学术的外衣加以传播的。这同样是这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。自然，其中也有从事比较深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，但也有多半出乎牵强比附、乃至臆造完全缺乏科学精神的，要融合东西文化，而且恰到好处，短时间是行不行的。

我们认为要比较全面而深刻地了解本世纪思想学术的全

貌，选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，经过认真的整理（包括校注），有计划地出版，是一项有必要的工作。所选著作中有的是当时的名著，其它也都有一定影响、可供研究者参考的。我们这样说，自然并不意味着，这些著作在一切重大问题上，已经得出科学的结论。我们相信读者的批判鉴别力。

严格讲来，不具有高水平的理论修养，兼及工作上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未经过刻苦的钻研，是很难在短期内写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专著。不是真正了解东西方思想文化本来面目和历史发展的，也很难融会贯通而成功地做出有创造性的新贡献。脚踏实地的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、新思想，就得不断结合实践，时时进步，时时创造，以期熔铸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于一体。这套《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》的出版，无疑会从一个侧面开拓人们的视野，使不致割断历史，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而细致，对提高我国现代思想学术的研究水平，必将有所助益。

是为序。

石 峻

1996年9月25日于北京

重版引言

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，尽管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流行一时，然而并没有为儒学的发展画上句号。与西化思潮相抗衡，现代新儒家思潮日益兴起，构成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方向。本书的作者马一浮是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重要成员。他与梁漱溟、熊十力齐名，被从学弟子并尊为“儒门三圣”。

马一浮（1883—1967年），浙江绍兴人，188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（当时其父马廷培任四川仁寿县县令）。原名福田，后改为浮。字一浮，号湛翁，晚年自署蠲戏老人或蠲叟，曾用过被褐、太渊、宛委山人、服休、圣湖野老、夕可老人等笔名或别号，以字行世。马一浮天资聪慧，少有学名，15岁应绍兴县试高中榜首。浙江富绅汤寿潜很器重他的才华，招他为婿。20岁时，妻子不幸早亡，他十分悲痛。为怀念爱妻，他竟终身没有续弦。戊戌变法之后他接受新学，到上海学习英文、法文和日文。他曾与谢无量、马君武共同创办《二十世纪翻译世界》月刊，致力于西学的翻译和介绍。1903年应清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之聘，赴美国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担任中文文牒。在美国期间，他还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秘书。工作之余，他研读亚里士多德、但丁、拜伦、莎士比亚、斯宾塞、达尔文、赫胥

黎、卢梭、黑格尔、马克思等人的文学或哲学著作，研究西方的学术思想。离开美国的时候，他到英、德等国游历，曾在柏林学习德国文学，并把德文版《资本论》第一次带回中国。1904年他回国不久即变卖家产赴日本留学，学习日文和西班牙文，阅读《资本论》以及哥德著《浮士德》等西方文学名著。1905年回国后，曾翻译西班牙文学名著《唐·吉珂德》，题为《稽先生传》。他目睹国事日非的局面，颇感困惑，遂绝意仕进，远谢时缘，闭户读书。他住在杭州广化寺和永福寺，阅读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，并立下了“学术救国”的志向。他希望通过学术研究的途径转移世风，起敝扶衰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一份力量。

在回国后的相当长的日子里，马一浮都过着隐居读书的生活，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学多才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。著名学者梁漱溟、马彝初、汤用彤、熊十力、朱光潜、苏曼殊、李叔同等人都同他有交往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他改变了闭户读书的生活，毅然决定出山。他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礼聘，在江西泰和、宜山等地公开讲学。1939年，他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参与创办复姓书院，出任书院主讲兼总纂。按照他的构想，书院有别于普通的高等院校，应当承继古代书院的文化精神。他为书院制定的学规是：主敬、穷理、博文、笃行，拟开设玄学、义学、禅学、理学等课程。他还想在四学之外再设西方哲学，但未能如愿。马一浮在书院讲学只维持了1年零8个月，便因故停讲。书院停讲后马一浮“寓讲习于刻书”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复性书院先后刻有《群经统类》、《儒林典要》等丛书28种，38册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马一浮返回杭州，继续讲学刻书。1950年他接受上海市长陈毅的聘请，担任上海市文物

管理委员会委员；后来又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、全国政协特邀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。1967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因受冲击一病不起，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。

马一浮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复性书院期间由从学弟子整理出版的。其中论著有《泰和会语》、《宜山会语》、《复性书院讲录》、《尔雅台答问》、《尔雅台答问续编》、《濠上杂著初编》等；诗作有《蠲戏斋诗前集》、《避寇集》、《蠲戏斋诗编年集》、《芳杜词剩》等。

在复性书院的讲学实践，是马一浮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在这一阶段，他的现代新儒学思想已经成熟。《复性书院讲录》是依据马一浮在书院的讲稿编辑成书的，可以说是他的现代新儒学思想的代表作。1939年，在复性书院开学的第一学期，马一浮首先讲了学规、读书法、通治群经书目举要等问题，讲稿编为《复性书院讲录·卷一》。接着，他又讲《论语》大义，讲稿编为《复性书院讲录·卷二》。然后再讲《孝经》大义，讲稿编为《复性书院讲录·卷三》。1940年复性书院第二学期开学，他讲诗教绪论和礼教绪论，讲稿编为《复性书院讲录·卷四》。第三学期讲《洪范》约义，编为《复性书院讲录·卷五》。1941年复性书院第四学期开学，他以《观象卮言》为题，讲述他关于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的看法，讲稿编为《复性书院讲录·卷六》。这六卷书均由复性书院陆续木刻出版。1941年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违背当初许下的“对书院以宾礼相待”的诺言，竟通知书院像普通学校那样填报讲学人员履历以及所用教材备核，遭马一浮严词拒绝。事后他遂产生离开书院的念头。经陈立夫和董事会的多次挽留，他才同意留在书院。年底，他写了一篇《告书院学人书》，宣布书院不再招生，将以刻书为业。马

一浮原本打算在书院系统地讲述儒家的“六艺之学”，现在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。

六卷《复性书院讲录》的中心内容，是站在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立场上重新阐释六艺之学。每卷之间既有内在的联系，又各有侧重。第一卷带有总论性质，向从学弟子提出基本要求，讲述学规和读书方法，开列必读书目，申明办书院的指导思想。马一浮为书院制定了四条学规。第一条叫做“主敬为涵养之要”。他解释说：“主一无适之谓敬。涵者，含容深广，虚明照彻。人心本体虚灵不昧，只为气禀所拘，物欲所蔽，不免昏暗，失其觉照。故须培植根本，加以充养。唯敬可以胜私，唯敬可以息妄。”第二条叫做“穷理为致知之要”。他解释说：“穷者，穷极之谓；致者，竭尽之称。即此自心之物，穷其本具之理，到得豁然贯通，不留余惑，方可名为致知。”第三条叫做“博文为立事之要”。他解释说：“道之显者谓之文，文之施于用者谓之事。博者，通而不执之谓；立者，确乎不拔之称。”第四条叫做“笃行为进德之要”。他解释说：“在心为德，践之于身为行。崇实有恒之谓笃，日进不已之谓进。行之积也愈厚，则德之进也愈弘。道德即尽性之事，践行即笃行之事。笃行合下当从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入手。”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制定的“为学之序”是“博学之，慎问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我们把马一浮制定的学规同朱熹的“为学之序”比较一下，不难发现，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：都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之地，视为修身养性的必经之路；都以弘扬儒家的仁爱精神和好学精神为宗旨。但是，马一浮重倡儒门学规显然是有感而发的。针对当时学界菲薄固有、全盘西化之风，他深感有必要重申主敬、穷理、博文、笃行等项要求，以便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增强民

族自信心。

第二卷讲述《论语》大义。马一浮同宋明理学家一样，特别看重《论语》一书，把《论语》视为入德之门，视为儒家经典中的经典。他认为，《论语》是儒家六艺的总汇，而孔子的言行堪称体现六艺之教的典范。第一，《论语》与《尚书》相通，包含着儒家书教的基本精神。“今观《论语》记孔子论政之言，以德为主，则于本迹之说可以无疑也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心，一也；有以得其用心，则施于有政，迹虽不同，不害其本，一也。后世言政事者，每规规于制度文为之末，舍本而言迹，非孔子《书》教之旨矣。《论语》‘为政以德’一章，是书教要义。”第二，《论语》包含着儒家礼教和乐教的基本精神。“《论语》中凡言‘不争’者，皆礼教义；凡言‘无怨’者，皆乐教义。”第三，《论语》包含着儒家易教的基本精神。“学者须念‘朝闻夕死’之说，圣人言之特重。此实易教之大义。”第四，《论语》包含着儒家春秋教的基本精神。“约而言之，《春秋》之大用，在于夷夏进退、文质损益、刑德贵贱、经权予夺，而其要则正名而已矣。‘必也正名’一语，实春秋之要义。”第五，《论语》包含着儒家诗教的基本精神。“六艺之教，莫先于《诗》。于此感发兴起，乃可识仁。故曰‘兴于诗’，又曰‘诗可以兴’。”马一浮充分肯定孔子儒家创始人的地位，对孔子表示崇高的敬意。在他看来，儒家的六艺之学实则发端于孔子，因此必须从《论语》入手，方才能够把握儒学的理论实质。从他的这一学术见解反映出，他主要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六艺学的，而是从哲学的角度阐发六艺学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所承接的不是汉学的学脉，而是宋学的学脉。

第三卷讲述《孝经》大义。《孝经》是儒家经典之一。据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《孝经》者，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。夫孝，天之经、地之义、民之行也。举大者言，故曰孝经。”《孝经》虽托名孔子，实则为孔子后学或汉儒所作。《孝经》宣扬孝道观念、孝治思想和宗法等级意识，因而五四以来一向为人们所诟病。马一浮却不作如是观，而对《孝经》予以很高的评价：“六艺皆以明性道、陈德行，而《孝经》实为之总会。……明此，则知《诗》《书》之用，《礼》《乐》之原，《易》《春秋》之旨，并为《孝经》所摄，义无可疑。故曰：‘孝，德之本也。’举本而言，则摄一切德；‘人之行，莫大于孝’，则摄一切行；‘教之所由生’，则摄一切教；‘其教不肃而成，其政不严而治’，则摄一切政；（政亦教之所摄。）五等之孝，无患不及，则摄一切人；‘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’，则摄一切处。大哉！《孝经》之义，三代之英，大道之行，六艺之宗，无有过此者。故曰：‘圣人之德，又何以加于孝乎？’自汉以来，皆与《论语》并称。”他认为，《孝经》同《论语》一样，也是儒家经典中的经典，应当予以高度的重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马一浮对《孝经》的阐释，并没有像宋明理学家那样着意宣扬“天下无不是的君父”等封建道德观念，而是把孝解释为“道德理性”的根本之所在，解释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原则。这说明他所阐发的乃是现代新儒家的孝道观念，表达了现代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。

第四卷讲述了儒家的诗教和礼教。马一浮认为诗教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“今治六艺之学，为力求仁也。欲为仁，须从行孝起；欲识仁，须从学《诗》入。故今继《孝经》后，略明诗教。”他对诗教的基本理解是“诗教主仁”。他认为儒家诗教的特点是把艺术同道德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并不是单纯的艺

术形式。基于这种看法，他在宣讲诗教时，主要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契人，而是从道德学的角度契人。他居然没有把《诗经》当作诗教的教材，却别出心裁地选用了《礼记》中的《仲尼闲居》篇。他逐句逐段地讲解了《仲尼闲居》篇的大部分章节，把儒家的诗教概括为总显君德、别示德相、明德用、叹德化四个方面。他指出，学习诗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生境界。“其所存者，纯是至诚惻怛；其感于物也莫非天理之流行。故曰‘无终食之间违仁。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’人心无私欲障蔽时，心体炯然，此理显现。如是方为识仁，乃诗教之所出也。”马一浮认为诗教和礼教是密切相关的。“六艺之教，莫先于《诗》，莫急于《礼》。诗者，志也；礼者，履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；在心为德，行之有礼。故敦诗说礼，即是蹈德履仁。”因此，他讲完诗教之后紧接着讲礼教。他讲礼教时也没有选用《周礼》和《仪礼》为教材，而是选用了《礼记》中的《仲尼燕居》篇。他将此篇分为显遍义、显中义、言治、简过、原政、简乱六科，着重阐发儒家崇尚道德理性的文化精神，而不大重视古代的典章制度，力图把儒家礼教从传统推向现代。

第五卷讲述《洪范》约义。《洪范》是儒家经典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相传为箕子所作。《尚书》向称难读，而《洪范》又是难中之难。马一浮对《洪范》篇全文作了解说，对《洪范》中的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、皇极、三德、稽疑、庶徵、五福六极等概念作了新的诠释。他推倒了自汉儒董仲舒以来关于《洪范》的各种神秘主义观点，运用理性主义观点重新解读这篇文化典籍。他指出，《洪范》篇的基本思想是倡导德政，这同孔子的仁学思想是一致的。他说：“六经总为德政，而《尚书》道政事，皆原本于德。尧舜禹汤文武所以同人心而出治道者，修

德尽性而已矣。离德教则政事无所施，故曰‘为政以德’。此其义具于《洪范》。”“今谓《洪范》为尽性之书，箕子所传。盖禹舜之道，王者修德行仁事义咸备于此。”通过对《洪范》的解读，马一浮阐发了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现代新儒家思想。

第六卷讲述易学思想。马一浮认为《易》在六艺之中处于理论基础的地位。“知《易》冒天下之道，即知六艺冒天下之道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故六艺之教，终于《易》也。”按照传统的说法，《易》为六经之首，马一浮却认为它是六经之终。他的这一提法更为凸显了《易》的本体论意义。易学包括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两个组成部分，马一浮比较重视《易传》，而不太重视《易经》。他认为《易传》出于孔子之手，正是由于《易传》所出现，才把易学由卜筮之术改造为义理之书，建立了完备的儒家易教体系。基此，他把解说的重点放在《易传》方面。他首先概述了易学的宗旨、卦的由来、象的本意；接着原吉凶、释德业、审言行、辨大小，诠释易学中的一些常用范畴；最后把《易传》的基本思想独创性地概括为“十大”，即教大、理大、德大、位大、人大、业大、时大、义大、器大、道大。通过对“十大”的诠释，马一浮阐发了心、理合一的本体论思想。

马一浮的《复性书院讲录》立足于现时代的理论需要，会通宋明理学中理学、气学、心学三派，化解儒学和佛学之间的对立，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现代新儒学论著。我们把它整理出来重新出版，以飨读者，相信它对人们深入了解儒家思想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发展历程、了解马一浮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会有所帮助的。为了便于阅读，我们把原来复性书院木刻版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，并且对于书中一些不太为人们熟悉的事件、人物、名词、术语等作了简要的注释，还将旧式句

读改为现代的标点符号。对于原版中明显的文字错误，我们直接作了订正，没有在注解中说明。为了忠实于历史，我们没有对书的内容作任何删改。

由于编者学力不逮、水平有限，加之时间仓促，本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敬祈读者不吝赐教。

宋志明

1997年10月

《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》编委会

主 编	石 峻
编 委	刘德久
	尹 铭
	张利民
	宋志明
	陈志良
	胡伟希
	高瑞泉

目 录

卷 一

开讲日示诸生·····	(3)
学规·····	(5)
读书法·····	(20)
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·····	(30)

卷 二

题识·····	(47)
群经大义总说·····	(48)
《论语》大义一（诗教）·····	(55)
《论语》大义二（书教）·····	(59)
《论语》大义三（礼乐教上）·····	(64)
《论语》大义四（礼乐教中）·····	(68)
《论语》大义五（礼乐教下）·····	(72)
《论语》大义六（易教上）·····	(76)
《论语》大义七（易教下）·····	(80)
《论语》大义八（春秋教上）·····	(84)
《论语》大义九《春秋教中》·····	(89)